

# 第一章 档案馆的起源

档案不仅是产生它的政府的共同记忆，而且也是国家的共同的记忆。每个国家都需要档案馆作为记忆的仓库，存贮、保护和传播以往的知识经验。

## 第一节 档案

在人类文明的史前时期，作为人类祖先各类活动史实的历史只留存在原始先民的心中，通过口头文化来加以流传，诸如伏羲氏结网捕鱼、神农氏种植五谷百草、燧人氏钻木取火等等，就是这种远古传说。因此，各民族的早期历史，或多或少是由那些在文字出现之前从祖先那里靠记忆传下来的传说组成的。由于口耳相传的史实容易失真和失传，从而使许多史前事实、事件和活动也随之消失。对于后人而言就成了千古之“谜”。

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业、原始手工业等的萌芽，社会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为了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要求，改变口传心记中的模糊、易变现象，人们逐渐创造了符号，从而使得人们有可能把过去一去不复返的史实记录在符号这一载体中，并使之保留下来。

符号可以具有任何一种实在形态，同时，一个符号的含义和价值，都不是由其实在形态的固有特性所产生或决定的，各种符号的含义及其来源取决于使用它们的人类，他们将含义加诸于实在事物或事件之上，从而使它们成为符号。正如约翰·洛克先生( John·Lock )所指出的：各种符号“具有为人类任意强加于其

上的含义<sup>①</sup>。

现有的研究表明 在世界各地众多未开化部落的文化中 前文字的象征和记号表达往往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主要方式。一般而言,前人采用的符号系统大致分为二类,一类是约定的记号,另一类是直观形象。前者如‘结绳’、‘结珠’、‘讯木’等。作为符号系统之一的结绳记事方法,曾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在古籍的记载中以及文化史的研究中,可以得到证明。如中国唐代李鼎祚先生的《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 其有约契之事 事大大其绳 事小小其绳 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sup>②</sup>。在我国云南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有史前时期原始人结绳与刻契的实物。

拉丁美洲的土著居民——印加人也采用称之为‘基普’的结绳记事方法来传递储存信息,“他们在一根粗绳上拴有很多条细绳,涂上各种颜色,在这些细绳上打上不同的结,用这些结的形状和位置来记录数字,用结绳颜色、长度的不同排列来表明税收、人口和军事行政事务等,形成了大量的结绳记事档案”<sup>③</sup>。“讯木”是指在一根木条上 刻上各种花纹或插进各种东西,它可以用来帮助记忆,也可以用来传达命令。可以认为,这种记事方式中就已经包含了“录以备考”的档案意识。后者曾被很多人称为绘画艺术或刻划艺术,图画符号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均占有相当的地位,但原始人的图画符号最初并不仅仅是为了艺术享受而创造的,由于图画符号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我

① 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北京:商务出版社,1981.462

② 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

③ 何嘉荪.拉丁美洲各国档案工作概述.档案学通讯,1986(3):66.

们的先人们为了满足其生产、交流、备忘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开始采用图画符号记事。从图画符号到真实文字的过渡，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今天的文字学家们普遍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系统，如我国的甲骨文、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等，均源于图画符号。

人类使用符号能力的出现，标志着世界文明的诞生。因为符号的出现，使史实从单纯的内心记忆状态转化为物化的符号状态，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知识、信息的交流、保存以及积累提供了可能。借助于结绳、刻契、图画等符号的解读，可以再现或部分再现历史。原始记事符号虽然也能够表意，但是由于每一独立表意单位的构成繁琐，包含的信息量少，很难表达复杂的事物；更由于实物记事、图画记事所采用的符号具有表意的不稳定性、主观随意性并且与有声语言又不相关联所以尽管均承认在一定范围具有记事、备忘信约和凭证的功能，原始记事符号终究不能成为记录信息的理想手段。

文字的产生，为档案由萌芽形态发展到成熟形态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因为文字是一种记录人们思维、意识的书写符号系统，凡是人们能用口语表达的都可以用文字精确地记录和表达。文字克服了原始记事的种种缺点，能真正承担起“记录历史”、“传递信息”、“存贮知识”的重任其记录和流传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传之久远。正因为如此，尽管我国档案界对于档案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一般都认为文字是档案产生的必备条件之一，如周雪恒先生认为：档案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文字和国家的出现是档案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陈贤华先生也认为：档案起源于用文字书写文献之时，文字是档案产生的前提条件。而社会的发展，则最终促成了档案的产生，古人所言：“上古

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sup>①</sup>，大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sup>②</sup>，正说明了档案产生的社会历史因素，即原始社会末期，人与人之间有了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了社会的管理，信息交流不仅范围广、内容杂，而且要能经久、能贮存，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档案应运而生。档案是适应“把社会记忆扩展到人们大脑之外”这一历史要求而产生的。

究竟什么是档案？或者，档案是什么？

由于世界各国、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差异、文化传统的差异，加上社会不断发展等因素，使得人们对于档案这一特定事物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各国在档案制成材料、档案存在形式等方面的不同，正如普列汉诺夫先生所指出的：“人是从周围的自然环境里取得材料，来制造用来与自然斗争的人工器官。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sup>③</sup>。而文化传统的差异，则决定了各国在档案特性、价值等认识上的差异。社会的不断发展，则使人们在不同时代对于档案有不同的认识。因此，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档案这一事物有着种种不同见解。

自19世纪末荷兰档案学家萨穆·缪勒、约翰·斐斯和罗伯特·福罗英在著名的《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中提出“档案是某一行政机关或其某一官员正式收到或产生并被指定由它们保管的书写文件、图片和印刷品的总和”这一概念以来，英国的希拉里·詹金逊先生、前苏联的T·A·克雅捷夫先生、德国的阿道夫·布伦内克先生、美国的T·R·谢伦伯格先生，我国的何鲁成先

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6。

②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168。

生、吴宝康先生等国内外著名档案学者都各自提出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档案定义。此外，各国的档案法规也都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档案定义，尤以《法兰西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对档案概念的表述最具代表性。国际档案理事会在明确档案概念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 1984 年编纂的《档案术语辞典》中提出集欧美档案定义之大成的档案概念之后，又在《从档案角度管理电子文件的指南》中根据变化了的档案工作实际指出：“档案是机构和个人在发起、实施和完成的活动中产生或接收的记录信息，包括足以对活动能提供证明的内容、背景的结构，而不考虑其形式的媒介”。

可以这样认为，为了认识档案的特点，明确档案的范围，掌握档案形成的一般规律，从而科学地管理档案，留存社会记忆，中外档案学者对档案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中外档案学者对档案概念的不懈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对于档案概念的认识，不可避免会受到时空条件的制约，人的认识总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不断发展、逐步深化的。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对档案的认识也是不同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所有的定义都只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的联系”<sup>①</sup>。无论从“档案是行政机关形成并保存的文件”到档案的“历史记录”属性、“记录信息”属性的认识，还是从“本机关工作和生产中形成的”到“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的认识历程，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即只要社会在发

① 列宁，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808

展，对档案的认识问题将保持其现实性，而且对这一问题的任何解决 犹如社会的发展 是未完结的。

第二 档案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具体事物 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存在而存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变化的。随着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电子文件已大量出现。一般而言，电子文件是指能被计算机识别、处理、存贮在磁带、磁盘或光盘等介质上，并可以在网络上传递的代码序列。它的产生、形成、归档及其传送、存贮、保存等管理均与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所用的技术不同。正如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王刚先生在“电子和其它现行文件委员会年会”及“国际档案保护技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电子档案的产生，改变了传统观念中对档案的理解，也改变了对档案存在形式、特征、特性、意义的认识。

第三 既要以历史的眼光解读档案 更应该以现代人发展的眼光解读档案。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认识），我们应将其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思考与评判。对待历史上存在的事物，我们应采取宽容的态度，而不是求全责备，应根据其本质属性衡量是非。随着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型载体档案已大量涌现，“比特”正在取代汉字，电子文件具有信息的非人工识读性、系统依赖性、信息与载体之间的可分离性、信息的可变性、信息存储的高密度性、多种信息媒体的集成性、信息的可操作性等诸多特性。电子文件的出现，必将对文字是档案产生的条件的传统看法产生冲击，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档案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从古代的竹木简、甲骨、金石、纸草、泥版、羊皮纸、蜡板、棕榈树叶到近现代的纸张、感光材料、磁性材料乃至目前尚未为人知的载体材料，只要其具有历史记录的功能，我们均可以视其

为档案 而不论其具体的存在形态及转化、形成过程如何。换言之 对我们来说“档案远不仅指过去活动中形成的书面文件 远不仅指由政府机关、私人团体、个人以及家庭产生的值得永久保存的文件总体。档案是有关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文化遗产。档案提供了有关人、地理位置、事物和事件的信息”<sup>①</sup>。

国际档案理事会的会徽图案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圆形图案的中间是两张人脸图案，图案边缘为人类社会曾经使用过的各种记录符号和记录手段，象征性地描述了以各种形式表达的人类思想的演变和认识，即从最初的象形符号到后来的拉丁字母再到现代社会中使用的集成电路块，包容了历史、现在、未来所呈现的各种形态。它既喻示着人类需要信息交流 并且 人类的信息交流需要档案这种工具，其关键在于档案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人们历史和现实的要求，它能够消除一种不确定性 同时也喻示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会造成档案记录形式和记录手段的不断演变。会徽图案反映了档案的属性和目的，即为了现代社会和世世代代的利益，保护人类的共同记忆。会徽图案给我们以启迪，拓展了我们遐想的空间。

简言之，对于档案概念认识的深化主要体现在：(1)档案的形成范畴，已逐渐脱离了等同于政府机构所形成的档案认知模式，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均会形成各自的档案；(2)档案内涵认识的深化，档案既不等于国家所有的档案，也不等于具有国家和社会保存价值的档案；(3)认识形式的扩展，文字不再是档案成其为档案的必要条件。正如谢伦伯格先生所认为的：档案一词

① U·O·A·埃恩·档案学：国家和文化传统，还是一门国际学科？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212。

显然并没有一个不可更动而必须优先采用的、最终的、最完备的定义。它的定义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作不同的修改，以适应不同的需要。而且，在不同的时代，亦可以作不同的修改，以适应不同的需求。

## 第二节 档案的作用

历史是以往的一系列发生过的事实、事件与活动。过去是一个相对的时间范畴，今天的事件到了明天就成了过去，明天也依次成为过去“逝者如斯夫”，一切都在时间中绵延。时间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因而，历史亦复如此，一切现存的东西都将成为过去，甚至未来也将成为过去。但是，历史是永恒的，向着现在和未来开放。

李鹏委员长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档案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1 世纪，人们无论是为追求繁荣与发展，还是为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都需要借鉴前人的智能和历史的经验，因而档案对于人们将会变得更加重要。怎样保存和利用好前人留下的历史遗产，又为子孙后代留下真实的历史记载，是需要国际档案界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历史是一个既简单而又复杂的概念。一般而言，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的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指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先生认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因此，只有借助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而奥特加先

生则认为：“我们之所以了解昨天，只能是通过乞灵于前天，而前天也如此类推。历史是一个体系，是全部人类经验之联成为一个单一的、无可抗拒的链锁体系”<sup>①</sup>。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历史是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

由于历史包容了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和经验，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解读并从中获得教益，所以，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提倡“君子以多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先生认为：“史之为用，乃人生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汤因比先生也曾说过，历史知识乃是一张告诉我们哪里有暗礁的海图，如果我们有胆量使用它，历史知识就可以变为力量和救星。

也就是说，尽管历史不能重演，但历史却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能给现实以参照和借鉴。具体而言，历史的功用之一，在于培养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和情操。鲁迅先生曾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这种源远流长的“中国灵魂”，具体表现为历代社会精英追求和倡导的各种崇高精神，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些精神汇集在一起，便构成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相继的国魂意识，成了华夏儿女立身砥行的精神支柱。

历史的功用之二，在于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有一条古训，叫做“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正因为如

① 奥特加，历史是一个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此 我国历来就有尊史、学史和治史的传统 如西周初年 因成王 ( 武王之子 年幼而由周公 武王之弟 摄政 待成王成年亲自理政时 周公叮主他“不可不鉴于有夏 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召诰》)由于周初王公重视以史为鉴 西周出现了奴隶制时代的盛世“成康之治”。而唐太宗为了“览前王之得失 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卷五四《国史部·恩奖》)也敕命魏征等重臣 鸿儒悉心修史 用 30 年修成了八史 即《梁书》、《陈史》、《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北史》和《南史》等 唐代出现的封建时代的盛世“贞观之治”与唐初君臣重视以史为鉴是密不可分的。

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把懂得历史看作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强调在学习理论的同时也学点历史 他认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他的一句名言是：“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为了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多种场合号召全党“认真地读一点历史”强调 学习历史 有助于开阔视野 鉴往知来。他指出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不可能成为文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它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诚如李大钊先生所言：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大观的征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历史给人以

智慧，教人以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深邃眼光去慎思明辨、判断是非、决定行止。只有深刻地认识过去，才能理解现在发生的一切，才有助于选择一条正确前进的道路，才能展望美好的未来。

历史事实是客观的 历史规律存在于历史事实之中 所谓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是对于历史规律意义的把握。正因为如此，为了探究规律，我们必须研究历史。而历史研究是通过对比据的解释进行的。柯林武德先生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指出：“既是过去的历史，就需要有证据；但是这类证据却是今天的史家在此时此地的当前世界中所现有的某种东西。例如一桩过去的历史事件并未为当前世界留下任何遗迹，那么，我们就对它毫无证据可言 因而也就对它一无所知”，但是过去留下了它自己的遗迹，哪怕这些遗迹并没有被任何人当作它的历史材料而加以使用；而这些遗迹是各种各样的，也包括历史思想本身的遗迹，即编年。我们保存着这些遗迹，希望将来它们可以变成它们现在还不是的那种东西，即历史的证据。我们现在通过历史思想所回忆的是过去的哪些个别部分和方面，取决于我们现在对生活的兴趣和态度；可是我们总是觉察到，还有其它的部分和方面是我们现在不需要回忆的；但是只要我们承认总有一天它们将使我们感兴趣，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应该是不要丢失或毁坏它们的记录。为了它们将来会变成历史资料而保存起来这些遗迹的工作，乃是纯学者、档案学家和古物学家的工作’<sup>①</sup>。柯林武德先生从历史的角度阐明了我们档案学者一直在努力阐述的一个问题，即档案的作用。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指出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记忆，它既然是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88。

一种记忆，就需要依靠准确的资料来作为可靠的依据。所以历史就应该借助于档案，否则就有脱离实际、凭空幻想的危险。”

档案是人类社会记忆的工具，是记载历史沧桑的“第一手材料”，档案是使我们的遗产永垂不朽的重要因素，档案记载着过去、孕育着未来。正因为如此，詹姆斯·B·罗兹先生在《档案管理和文件管理在国家信息系统中的作用的调研报告》中认为：“档案的首要作用是它作为整个国家的历史记录，能使一个社会立足于过去经验的认识，去理智地计划未来。……总之，档案中包含了数量巨大的关于人民、组织、社会和经济、自然现象和事件等等的情报，对于描述国家历史的完整面貌，是无价的原始资源。作为国家的历史的资源，档案在促进人民对其自身的了解和形成民族意识方面有着强有力的影响”<sup>[1]</sup>。具体而言，档案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 1. 档案是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要工具

布伦内克先生认为：“档案的高度评价首先是在他那国家的地位，档案主要是为了最高主权国家的实用利益而存在”<sup>[2]</sup>。作为国家最重要属性之一的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在国内的最高权力和在国际上的独立权力，即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国家的权力。领土则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和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档案对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内防止领土分裂，另一方

中国档案学会外国档案学术委员会，《文件与档案管理规划》报告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277。

布伦内克，《档案学——欧洲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1985，46。

面是对外解决领土纠纷。前者如西藏问题，我国保存的历史档案中有大量元朝以来中央政府在当地设置行政机构，委派官员和派军巡逻的记录，征收赋税和户籍田亩的登记与上报簿册等等档案材料，雄辩地证明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力地驳斥和打击了少数分裂分子和某些国家策划的“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由于国家领土的范围是通过边界来划分的，而边界的形成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主要是由多年的习惯形成，然后经有关国家用条约加以划定的。所以，在边界形成过程中，往往会形成一系列诸如条约、地图、勘界记录等档案，这些档案是领土归属的真凭实据，任何国家企图捏造材料，引起边界纠纷都是徒劳的。

### 2. 档案是政府机构赖以运转的基础

政府机构行使着国家权力，承担着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等职能。而档案是政府机构以往工作活动的记录，政府机构往往要利用他们自己的档案，研究他们的以往政策和工作计划、总结经验、分析研究计划的进展情况，研究案例，进行决策或制定与过去相一致的方针政策，所以档案“是一个政府籍以完成其工作的基本行政工具。它包含着必须加以保存以保障政府免受攻击的财务和法律证据，使自己的各种行动具有连续性和一贯性 需要借鉴这些经验去制定政策 处理社会、经济以及组织、程序等方面的问题”<sup>①</sup>。

### 3. 档案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保证

由于档案“是一切永久性公民权利和优惠权利的最终凭证，是一切导源于或者有关于公民与政府间各种关系之产权和财务

权利的直接凭据’<sup>①</sup> 所以 社会公民在解决房地产纠纷、财产纠纷、处理民事或刑事诉讼、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权、保护知情权等诸多方面可以凭籍档案的凭证作用，充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合同、契约、协议书等都是约束力很强的文件，在其转化为档案以后，在有效时间内约束力仍然存在，若有违反或破坏合同、契约、协议书的行 公民可据此提起诉讼，从而确保公民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近年来农民土地承包合同接收进档案馆保存，为保证土地承包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

#### 4. 档案是打击和揭露敌人的锐利武器

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为了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的指示组织人力迅速公布了沙皇俄国外交部的有关秘密条约等档案，使世人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相。列宁说：“我们揭露真相的时候，首先是公布秘密条约，使全世界看到让几百万人牺牲生命是为了什么”<sup>②</sup>。

同样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新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右倾化政治思潮泛滥；在政治体制上，法律制度上，均无限制否认侵略历史的规定；战后在教育方面的失误，未能用正确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使年轻一代了解侵略真相，因而右翼势力猖獗。在此背景下，日本一直试图否认侵略中国。日本文部省借审定教科书篡改历史，把侵略中国说成“进入中国”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 其主要借口就是缺乏与南京大屠杀同时期的原始资料。真实记载着南京侵华日军罪行的重

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北京:档案出版社,1983,16。

② 列宁.列宁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53。

要文献资料——“拉贝日记”“贝德士文献”以及原日军士兵东史郎“阵中日记”等的先后发现及公布，披露了 30 万南京市民被日寇血腥屠杀，大量房屋建筑、商店洋行和文化设施被洗劫、焚毁的惨痛历史，驳斥了“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捍卫了历史的真实。

#### 5. 档案是科学决策、科学研究等的必要条件

无论是科学决策，还是科学研究工作，只有详尽地占有材料，才能在探索事物发展规律的同时，启发思路、减少失误，提高决策工作、科研工作的效率和水平。“档案可以从两方面为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一方面，专门进行科学研究的原始记录，可供现实的研究工作直接借鉴；另一方面，从记录的广泛事实和经验的广泛事实和经验中，为各项研究活动提供大量的经验、观察和理论概括的基础材料<sup>①</sup>。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研究人员利用档案中所包容的诸如社会变革、历史事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边界疆域、行政区划、交通运输、天文气象、地质水文、物产资源、自然灾害、风俗民情等各个方面的具体素材，进行分析研究，容易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医务研究人员利用档案帮助研究工作，对遗传病和传染病进行探索。建筑工程师、古迹保护专家利用档案，可以了解和判断需修复建筑的原貌，以保证修复的可靠性，达到保护古建筑和遗址的目的。气象学家查阅特定地区的历年档案，汇总分析，找出该地区发生水旱冰雹灾害的规律，并据此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或减轻灾害，促进生产发展。

在 1998 年夏秋之交，在长江流域百年不遇的全流域洪水面

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在长江干支流设立的 1000 多个测报站点，随时向国家防总通报水雨情，发出了 19 万份水情电报，提供了大量的水文档案及水雨情现实信息，在长江防汛最为紧张、关键的时刻、本着对人民的高度负责的精神，科学地分析水情、雨情，为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提供依据。5 月 10 日长江第 5 次洪峰来临前沙市水位一路攀升，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预报次日 12 时沙市水位将达到 45.20 米，超过 45 米的分洪争取水位 0.20 米，一时荆江是否分洪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水文专家们经过对水文历史和现实信息的综合分析，得出了洪水在沙市段 45.22 米的水位只能维持 2 小时，而且超额洪量只有 3 亿多立方米的结论。即使启用荆江分洪区分洪，对监利以下河段作用也不大的结论。为此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荆江分洪运用的五点意见”，报国家防总，反映荆江分洪区的运用对缓解洪湖长江干堤的紧张状况有一定的作用，但没有决定性的作用，根据当时的水情信息对确保荆江大堤的安全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关键是加强洪湖江段的防守。在听取了包括长江水利委员会在内的各方意见后，11 日凌晨国家防总最终作出了荆江不分洪的果断决策，从而避免了启用荆江分洪区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这是科学的胜利，这是水利专家们的功劳，其中也有档案人员的一份功劳。

#### 6. 档案是宣传教育的生动素材

档案翔实地记录了人们创造历史的曲折历程和奋战的足迹，因此，利用档案写回忆录、著书立说、演讲报告、进行文艺创作、举办各种展览等，都富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比如，在 1997 年香港回归前夕，外交部档案馆的一位作者根据档案史料撰写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与一国两制构想形成》一文，回顾了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建国后关于香港回归问题上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发表于 1997 年 1 月 1 日，正是江泽民总书记元旦讲话提出香港回归将是本年度完成的一件大事之时。由于文章内容以档为据，时间、地点、相关事宜阐述得清晰准确，立刻引起媒体关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一位研究员撰写的《别了，香港总督》发表于彭定康下台的前一天——1997 年 5 月 30 日。作者从 1843 年 4 月 1 日领命的首任总督璞鼎查至 1997 年的下台总督，共计 28 名总督的有关情况悉数托出，象一部浓缩历史的短剧，令人回味无穷。而浙江省档案馆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面向社会举办的《历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大型图片展，短短 20 天，观众多达 1 万人次，社会反响强烈，收到了极好的社会教育效果。

正是因为档案具有多方面的作用，才决定了从其产生之时起，人类就开始了保存档案的活动。诚如意大利档案学家埃·卡萨诺瓦所指出的，保存档案是人类生而固有的需要，这种需要虽然为无知者所轻视，但是永远不能把它压制下去。保存档案的需求及其行为，奠定了建立档案管理机构的基础。

### 第三节 档案馆的诞生及其发展

随着档案的客观存在和数量的增加，为了保证档案在必要时能及时得到利用，发挥档案固有的凭证及参考作用，先人们从其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将档案保存在一个特定的场所，这种思想构成了近现代意义“档案馆”的思想萌芽。

#### 一、档案的原始保管机构

关于世界上第一个档案馆究竟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诞